政治科學論叢／第四十九期／民國 100 年 9 月／頁 75～124

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理論的知識論分析*

莫大華**

摘　要

國際關係作爲一門學科，其理論研究歷經多次大辯論，在第三次大辯論之後，學者引用實用主義（pragmatism）以規避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大辯論所引發的後設理論爭論（尤其是本體論與知識論的爭論）。歷經多年努力，實用主義已經在國際關係學術研討會、書籍與期刊成爲一股新興的研究趨勢，有些學者稱之爲「實用主義轉向」或是「意想不到的實用主義復興」。實用主義不僅影響整體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也影響到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知識論爭論。源自實用主義哲學重視實務、強調多元、真理共識的知識論（a 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有些建構主義學者（Friedrich Kartochwil、Emmuel Adler、Peter M. Haas 和 Ernst B. Haas）意圖結合實用主義的知識論主張，而成實用建構主義的知識論，反對 Alexander Wendt 的科學實存論觀點，強調回歸國際關係研究的基本，即是回歸「問題導向」的研究基本方向，並重視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多元觀點，以實務（實踐）爲先，發展務實的社會科學與國際關係，致使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知識論差異更受到關注。

本文主旨在探索國際關係學者引入實用主義哲學學者（Charles Peirce、Williams James、John Dewey 和 Richard Rorty）的知識論觀點，作爲其國際關係理論的後設理論基礎，所呈現的知識論特質、相對優勢、研究方法與貢獻；進而比較 Friedrich Kartochwil、Emmuel Adler、Peter M. Haas 和 Ernst B. Haas 等人的實用建構主義的知識論觀點，呈現其內部的異同；最後，探討實用建構主義理論研究的未來挑戰。

關鍵詞：國際關係理論、建構主義、實用主義、實用建構主義

---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民國 98 年 11 月 6 日中國政治學會民國 98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並獲得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補助經費（編號：98-2410-H-606-009），特此致謝。

** 國防大學政治系教授，E-mail: modahua@yahoo.com.tw。

投稿日期：99 年 9 月 15 日；通過日期：100 年 3 月 15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若其他條件不變，眞理就是我們同儕所將要說的一切。

～ Richard Rorty (1979: 176)

如果「第三次大辯論」的確是關於知識論的話，那實用主義或許就是這中間道路（*via media*）。

～ Donald J. Puchala (2002, xvi)

壹、前言

國際關係理論歷經第三次大辯論的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爭論之後，出現了 Kalevi J. Holsti 所稱的「1990 年代知識論的大停頓」（Holsti, 2001: 86）或 Fred Halliday 所謂的「知識論幻想症」（epistemological hypochondria）（Halliday, 1996: 320）。有些國際關係學者企圖引用實用主義（pragmatism）以規避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大辯論所引發的後設理論爭論（尤其是本體論與知識論的爭論）。[1] 歷經多年努力實用主義已經在國際關係學術研討會、書籍與期刊成爲一股新興的研究趨勢，有些學者稱之爲「實用主義轉向」（pragmatist turn）（White, 2002；Zaiotti, 2007），或是「意想不到的實用主義復興」（unexpected renaissance of pragmatism）（Wagner et al., 2001）。例如，在一九九九年，Molly Cochran 就出版 *Normativ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ragmatic Approach* 一書，綜合 John Dewey 和 Richard Rorty 的實用主義探討與批評 John Rawls、Michael Walzer、Andrew Linklater、Mervyn Frost、後結構主義與女性主義等學者的國際關係理論，認爲實用主義有助於突破規範性國際關係理論的僵局（Cochran, 1999）。在二〇〇二年 *Millennium* 期刊出版了實用主義的專輯，編輯們指出：

實用主義藉由鼓勵多元觀點的研究型態，而獲得不同理論理解的互補優勢利益，提供方案克服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間相對的

[1] 實用主義又稱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務實主義（practicalism）與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等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僵持狀態，以及絕對獨家的本體論造成的國際關係停滯。實用主義明顯地將社會科學固定於（研究、行爲主體）社群的意涵，並使研究適合其改善的想法（the idea of its betterment）（The Editors, 2002: iii）。

在此專輯中，多位學者就實用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性，分別以個案研究或理論研究方向說明實用建構主義的觀點，但並未引起學界關注與重視。直到二〇〇七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以建構主義學者 Fridrich Kratochwil 的實用主義爲核心主題進行探討，多位學者提出回應與批評，主要引起關注的是 Colin Wight 以科學實存論批評，Kratochwil 進行回應（Kratochwil, 2007c；Wight, 2007a: 40-56），後來 Wight 又進行回應（Wight, 2007b: 301-315）。二〇〇八年，Harry Bauer 和 Elisabetta Brighi 合編 *Pragmat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一書出版，更是將實用主義以社會研究的觀點，探討其對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規範的貢獻與限制（Bauer & Brighi, 2009a）。二〇〇九年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也以 Pragmat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爲題舉辦論壇，探討實用主義的理論性質（思想與行動一致的理論）、重視實踐、研究方法（理論綜合（theory synthesis）、分析折衷（analytic eclecticism）與逆推法（abduction））、簡化實用主義（從社會理論簡化爲問題導向的分析折衷）、修辭（rhetorical）實用主義對國際關係的附加價值，以及實用主義的本體論與知識論等等議題（Hellmann, 2009: 638-662）。無論是後設理論的探討或是研究方法的探討，陸續有許多研究著作出版。此時，似乎「實用主義轉向」已經成爲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議題，尤其推動此轉向的許多國際關係學者是建構主義理論學者（例如 Fratochwil、Emmuel Adler、Peter M. Haas 和 Ernst B. Haas），這些實用建構主義學者也對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知識論爭論提出另類知識論的主張，[2] 意圖以實用主義突破後現代（批判）建構主義與現

[2] 無論是實用建構主義、建構主義理論中的實用學派或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實用主義」等等，前二者在本文中視爲相同的，較有爭議的是，國際關係實用主義理論（學者）是否就是實用建構主義（學者）？換言之，是否存在著實用現實主義或實用自由主義？事實上，若是理解實用主義哲學的涵義，就可以知道國際關係實用主義會是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因爲在本體論與知識論上，實用主義是社會本體論、社會知識論的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代（傳統）建構主義之間的知識論僵局或焦慮。

本文的目的即是探索學者引入實用主義哲學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其實用主義哲學的起源與基礎，以及實用建構主義學者如何吸納此哲學基礎，提出其知識論主張，並論析其可能面臨的挑戰。除前言外，本文區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探討主流建構主義的科學實存論知識論立場，作爲理解建構主義內部知識論差異的基礎；第二部分探討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的哲學起源，關注實用主義哲學的知識論基本主張，包括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學者經常引用的 Peirce、James、Dewey 和 Rorty 等四位實用主義哲學學者的觀點，以作爲理解國際關係理論實用主義學者的哲學基礎；第三部分探討國際關係理論實用主義學者的認定、知識論特質、知識論優勢、多元研究方法與貢獻，作爲理解其知識論基礎論述的依據；第四部分，藉由比較 Kratochwil、Adler、Peter M. Haas 和 Ernst B. Haas 等人的實用建構主義知識論觀點，呈現實用建構主義內部的異同，以說明學者不同的關注面向；最後，探討實用建構主義理論研究主題的未來發展前景，即是其面臨的挑戰。

貳、主流建構主義的知識論立場 —Wendt 和 Checkel 的科學實存論

知識論是指研究知識的定義、基礎與有效度，它關注的是我們如何獲得有關社會世界的知識。就知識論提供評斷科學知識的不同基準，知識論可區分爲經驗（或解釋）的知識論與理性（reason）（或詮釋）的知識論，前者認爲科學知識主要是以人類經驗爲基礎，藉以解釋社會世界。即是人類觀察或其他感官所獲得的證據是建立科學知識的基礎，所有的科學假設都必須是可以此證據驗證的（verifiable）。相對地，後者主張先存的理性（a prior reason）在獲得知識的重要性，人類藉由理性思考而獲得知識，

用哲學，相互建構的知識論（即是哲學上的建構主義），所差異的是這些國際關係實用主義（學者）之間的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程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知識是不限於人類經驗之內，它是以同理心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用以理解與詮釋人類的社會世界，人類知識的功能是在反映物體存在本身，以創造此物體的方式詮釋此認知過程。基本上，客觀的物質主義（objective materialism）的本體論是與經驗論者或解釋式的知識論有關聯，主觀的理念主義（subjective idealism）的本體論則是與理性論者或理解式的知識論有關聯。但也不必然如此，兩者亦可交會，這是個偉大的哲學辯論議題，至今仍無定論。主流建構主義學者 Wendt 即是以科學實存論作爲此交會的哲學基礎，引發了其內部的知識論爭論。根據 Wendt 的說法，科學實存論有三項原則：(1)（經驗）世界是獨立於個別觀察者的心智（mind）與語言之外；(2) 基本上，成熟的科學理論是與此（經驗）世界相關連；(3) 即使當此世界是不能直接觀察的（Wendt, 1999: 47-91）。簡言之，Wendt 認爲經驗世界是客觀存在，即使不能直接觀察的主觀理念，也能以科學理論予以探討，即是能以科學理論研究不可直接觀察的主觀理念構成的經驗世界。

在本體論上，國際關係建構主義者絕大多數是主張主觀的理念主義的本體論；在知識論上，建構主義學者也多是詮釋、理解的知識論。但建構主義學者的主張仍是有程度差異，甚至有極大的差異。就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而言，本體論與知識論的爭論是重要的議題，即使是同屬建構主義的學者依然爭論著此重大議題，無論是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焦慮或僵局（莫大華，2006a），或是本體論一元論（monism）或二元論（dualism）的緊張關係（Jackson, 2008: 150-153），甚至是創造「主客觀」（sobjectivism）綜合本體論與知識論而成建構主義的方法論（Pouliot, 2007），都呈現出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差異與方法論多元現象（莫大華，2009）。尤其是在國際關係理論建構主義學者尋求「建橋計劃」（bridge-building projects）的理論綜合（莫大華，2006a；2006b；2007），以及探討批判實存論（critical realism）或科學實存論在國際關係理論的作用（Wendt, 1999；Joseph, 2007；Kurki, 2007；Wight, 2007c；Chernoff, 2007；Brown, 2007；Kurki & Wight, 2007: 13-33），甚至 Alexander Wendt 引用「量子意識理論」（quantum consciousness theory）作爲其科學實存論建構主義的知識論立場，發展量子社會科學（Wendt, 2006: 181-219）。如果說 Wendt 的科學實存論建構主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當前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主流理論，實用建構主義就是主要的另類理論了，[3] 建構主義內部這樣的現象已經引起學者關注其未來發展方向與影響。簡言之，就是建構主義理論並沒有共同的知識論立場，而是存在著不同的差異（莫大華，2006a；2006b）。

建構主義內部的爭論與批評是非常激烈的，主要是集中在批評以建立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中間道路（*via media*）的傳統（conventional）建構主義或現代建構主義，其代表學者如 Alexander Wendt、Jeffrey Checkel，他們嘗試結合相互主觀（後實證主義或詮釋主義）本體論與客觀（實證主義）知識論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建立中間道路或溝通橋樑，由於此企圖使其藉由批判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現實主義）而成爲建構主義內部的主流理論（莫大華，2006a；2009）。即使主流建構主義的知識論是以實存論爲基礎，但學者之間仍有不同的主張，Wendt 與 Checkel 是採取科學實存論，但由於 Wendt 強調本體論比知識論重要，並不太在意知識論的議題；Checkel 則認爲知識論重於本體論。

Wendt 認爲社會科學家不需擔心知識論問題，關鍵在於解釋世界而不是爭論認識世界的方法，知識論一般會自行處理認識世界的方法（Wendt, 1999: 373）。他更運用量子意識理論（假設）作爲強化其科學實存論的主張，嘗試以量子力學理論的「（知識論）非基礎論層面」（non-foundational aspect）說明實證主義的解釋與詮釋主義的理解所提供的知識都是部分的，而兩者必須互補，描述才能完整。因此，他提出「知識論的威斯特伐利亞」（epistemological Westphalia），認爲兩者相互承認對方在了解（國際）社會生活的共同目標上之貢獻（Wendt, 2006: 216）。簡言之，就是應該像是尊重各國主權一樣，各種知識論主張都可以。

Checkel 則認爲無論是何種類型的建構主義都能從其他相對類型的建構主義獲得協助，傳統（現代）建構主義運用詮釋（後現代）建構主義的論述研究法，詮釋（後現代）建構主義則是運用了傳統建構主義的過程追蹤法，皆可以科學實存論、分析折衷主義、實用主義與傳統主義達成混合

[3] 另一個反對黨是極端的後現代建構主義，以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哲學理論作爲其知識論主張的建構主義學者。例如 Richard Ashley、Andrew Linklater 等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方法的目的。而且，隨著建構主義學者逐漸關注研究方法，建構主義之間的方法論爭論未來將超越知識論爭論（Checkel, 2001）。從比較這兩位主流建構主義學者的後設理論觀點（見表 1），即可以看出，要嘗試建立在現代建構主義的科學實存論的知識論一致性或統一是不可能的、不必要的，也是不容易的。不如尋求知識論的共識，也就是承認知識論的多元性，承認建構主義沒有共同的知識論基礎，差別的只是研究方法而已（莫大華，2009）。

表 1　Wendt 和 Checkel 的後設理論觀點比較表

	Wendt	Checkel
科學哲學觀點	科學實存論	科學實存論
本體論觀點	本體論優先於知識論	知識論重於本體論
知識論觀點	1. 科學多元化的實證主義； 2.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沒有不同，科學解釋也可運用在社會科學； 3. 解釋與理解之間並沒有差異，因果解釋鼓勵務實的研究途徑，構成理解要以經驗證據來判斷。	1. 關注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以過程追蹤的研究方法與科學實存論作爲建構主義內部知識論基礎； 2. 各類型建構主義相互協助； 3. 混合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
方法論	1. 多元、折衷的方法論； 2. 研究是問題導向而不是方法導向； 3. 質化形式理論方法或量化方法都可以。	1. 建構主義之間的方法論爭論未來將超越知識論爭論； 2. 概念多元主義及後設理論多元主義鼓勵相互對話與學習。

資料來源：修正自莫大華（2009：71）

於是，另有建構主義學者則是致力於以實用主義作爲其反對主流建構主義學者 Wendt 科學實存論的知識論主張（Bauer & Brighi, 2008），以及抵抗「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本體論挑戰（Teti & Hynek, 2007），其中包括 Kratochwil、Adler、Peter M. Haas、Ernst B. Haas 等多位著名建構主義學者，這些學者自稱爲或被稱爲「實用建構主義」（pragmati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onstructivism）（Haas and Haas, 2009）或是「規範（取向）建構主義」（normative constructivism）（Guillaume, 2005）或是「新古典建構主義」（Ruggie, 1999: 240-242），他們引用 Williams James、Richard Rorty、John Dewey、Charles S. Peirce 和 John Austin 等實用主義哲學學者的著作論述其實用建構主義的知識論觀點，挑戰以科學實存論爲知識論基礎的主流建構主義理論（主要是 Kratochwil 對 Wendt 的批評，如後述），企圖使建構主義或國際關係理論脫離無謂的形而上的爭論，回歸「問題導向」（question- driven）的研究基本方向，發展務實的（practical）社會科學與國際關係，提供務實的實用知識。這樣的知識論主張，也引發國際關係學者的爭論，面臨不同的挑戰而需要對此作出回應。

參、實用建構主義的知識論起源—實用主義哲學

要理解國際關係理論實用主義學者的知識論基礎與主張，就必須先理解其哲學源頭－實用主義哲學－的知識論主張。實用主義是從希臘字πραγμα（行動）衍生而來，源自於十九世紀七〇年代的現代哲學派別，而在二十世紀的美國成爲一種主流哲學思潮與運動，並且蔓延到歐洲大陸。主要是由美國十九世紀哲學家 Peirce 與 James 所創立的實用主義，事實上是一種哲學上的知識論和方法論，其主張是在哲學上任何有意義的區分，都必須在實踐上做出相應的區分，以及產生經驗上的效應。在他們之後最重要的實用主義哲學家 Dewey，試圖檢討傳統哲學中的許多二元論（dualism）是否有實踐上的基礎、並且能產生經驗上的效應（Dewey, 1917；1929）。另外，Rorty (1979) 則是新興起的實用主義學者，他主張除去將知識建立在客觀的與先驗主體的「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立論，一種從笛卡兒的（心智）鏡像迷思（Cartesian myth of the mirror），[4] 轉而提出一種反本質主義的、歷史的哲學觀，而重視社會實踐，即是要撤除既有知識論的自我迷思，而是以社會實踐經驗爲知識論觀點。有些國際關係學者爲突

[4] 本質主義是指假定了知識具有客觀與先驗主體的本質，使知識之所以成爲知識的本質。鏡像迷思是指如同鏡子般反映知識的本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破第三次大辯論所帶來的知識論瓶頸而採取實用主義的知識論觀點與方法論，選取了實用主義哲學討論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論議題，意圖使國際關係理論回歸實務議題。

一、Charles Peirce 的實用主義觀點

Peirce 認爲實用主義是一種正確思考的原則與方法（Turrisi, 1998），[5] 其實用主義的起點是「探究方法」（methods of inquiry）的哲學分析，「猜測宇宙的構成」則是其哲學的終極目的，他以「進化的愛」（evolutionary love）作爲宇宙生成變化之原理，以「連續原理」說明經驗爲主客、心物連續不絕的整體。從「探究方法」的哲學分析到宇宙變化原理的提出，他的實用主義是逐步發展而成，主張「只要知道事物產生的實際效用，即知該事物之爲概念的意義（meaning）（Peirce, 1903b: 251-252）」。因此，Peirce 的實用主義也是「意義理論」，是描寫思想符號的符號學（Semiotics），進而根據康德致知（knowing）、感受（feeling）與意志（willing）之心理區分，6 發展出現象存有方式（modes of being）的三性理論（Firstness, Secondness and Thirdness），第一性是明確定質的可能性（the being of positive qualitative possibility），第二性是實際事實（the being of actual fact），第三性是法則（law）（Peirce, 1940: 74-94）。就符號學而言，符號本身是第一性，它所聯結的客體是第二性，它的詮釋（interpretant）是第三性，而產生情緒（emotional）詮釋、精力（energetic）詮釋與邏輯（logical）詮釋，符號學就是這三性互動合作的過程（Peirce, 1903d: 345）。[7] 他也發展出演繹、歸納與逆推（abduction or retroduction）三種推理方法，前兩者是既有的推理方法，逆推法是不同於兩者的推論方法（Peirce, 1903a: 151），[8] 他甚至認爲實用主義的問題就是逆推法的問題

---

5 此觀點是引用 Patricia Ann Turrisi 的書名，她在 1998 年編輯出版他 1903 年哈佛大學講座有關實用主義的演講，是可以迅速理解其實用主義思想的著作。

6 這是康德在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書中所分析，中文本參閱鄧曉芒譯（2005）。

7 有關 Peirce 的著作，學界主要是參考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編輯的六冊，以及 Arthur W. Burks 編輯的二冊。本文則是參考以 1994 年出版的該書爲電子書的版本。

8 Peirce 的逆推法的基本格式是「令人驚訝的事實 C 被觀察到了，但如果 A 是眞的，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eirce, 1903c: 196），可見逆推法的重要性。[9]

Peirce 的實用主義強調科學實驗的精神，凡事都求實用（pragmatics），不得仰賴直觀；在實用主義指導下的科學行動是自我控制的行動，不是本能，而必須藉由科學實驗探究（inquiry）真理。「探究」爲追求真理的動力，使人由懷疑不安的心理狀態轉化到確定不移的信念（beliefs）。「懷疑」是笛卡兒從事哲學思維的起點，但笛卡兒式的普遍懷疑論是既不是真正的，也是沒有必要（Peirce, 1868: 228）。因此，他認爲想要刺激引導人從事「探究」的懷疑，必須是真正的「懷疑」，足以引起內心不安的困惑。他認爲不能引起行動的觀念，不足以稱爲信念。信念是塑造人類欲望與行動的心理法則，並漸漸形成人們思想與行動的習慣，它不只與當前觀念有關，也決定未來的行動。笛卡兒的「懷疑」則是缺乏信念，它具有擾亂人心造成不安的作用，而「探究」就是要去除懷疑，使心靈恢復固定（fixation）信念的平靜，「探究」的唯一目的就在安定。爲求信念之固定，Peirce 提出了科學的方法（method of science），信念藉由科學方法可以由獨立於個人或社團之好惡的外在真實決定。唯有採用科學方法（即是以人的知覺法則（laws of perception）才能掌握實際的自然法則（Peirce, 1877: 5-22）。[10] 簡言之，他認爲具有行動意涵的信念是科學探究真理的動力，即是思想產

C就會是理所當然之事，因此，猜測A是眞的是合理的。」（The surprising fact, C is observed. But if A were true; C would be a matter of course. Hence, there is reason to suspect that A is true.）

9 逆推法是根據過去的經驗找出最易接受檢證的假說，再經由實驗檢證以確定過去的經驗是否適用於未知的經驗領域。他以 Johannes Kepler 利用已有的天文紀錄修正 Brahe Copernicus 行星繞太陽軌道的假設（各行星以同心圓圍繞太陽）爲例說明逆推法，根據天文紀錄，Kepler 發現 Copernicus 的假設並未使天文學家能更準確預測行星的運行軌道。Kepler 對火星及地球試了各種大小不同的圓、不同的圓心（不一定是太陽）、不同速度，意圖畫出其運行軌道，但總是與天文記錄有出入。他遂放棄等速圓周運動模式，而改爲變速圓周運動，還是沒有成功。最後他改爲各種不同的蛋形線，終於發現橢圓軌道最符合記錄。Kepler 於是假設太陽爲行星運行軌道的焦點，成功解釋了各項天文觀察事實。所以，逆推法既依賴於過去經驗，更依賴於對未來經驗的邏輯設想（Peirce, 1903a: 150-156）。

10 其他還有「固執方法」（the method of tenacity）、「權威方法」（the method of authority）與「先驗方法」（the a priori method），都能夠用來固定信念、擺脫懷疑的狀態，也各有其優缺點，但是能夠穩定地固定信念的科學方法才算是好方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信念，信念指導行動，行動養成習慣，以及未來行動的可能性。但他並不認爲所有的思想或概念的意義在於行動，而是在於習慣，因爲思想指導行動，以思想引導吾人內心世界的活動（inward activity），內心世界的思想不斷地重覆，而直接影響到人們的具體行動，即形成習慣，習慣是行動在外在世界不斷重覆的結果。如此，習慣將對外在世界中的實際行爲發生影響，尤其是個人努力從事重覆行動養成習慣時，更會影響及個人的未來自我（Peirce, 1906: 284），遂將自己的觀點稱爲「實效主義」（pragmaticism）。

Peirce 的實用主義特點如下：(1) 一切的思想都是符號，符號的意義可藉由表達其他符號，或以表達該符號所代表之事物所造成的實際作用或效果；(2) 如果無可見的效果，則有關「存在」的陳述皆屬無意義。因此哲學應探討可用的科學方法探究；(3) 命題所蘊含的實驗現象總和，即是其對人類行爲的影響，亦即其意義（meaning）；(4) 真理是持續不斷以實驗探究（科學方法），考察其意見者最後共識的事物，而這類探究的對象即是真實（reality）；(5) 不是所有的普遍概念皆反映真實，只是有些普遍概念（例如決定物體規律運動的自然法則，以及影響人類行爲的正義公理），才會反映真實；(6) 思想的最高目標與至善，並不在於行動，而在於人根據普遍或社會的理性意圖，不斷從事自我控制養成習慣（habits）的演化歷程（Peirce, 1905: 203-225）。由此可知，他認爲思想的意義是由實際效果所表達的，真理是以科學方法探究對真實的共識，進而以自我控制的行動習慣，成就思想的最高目標與至善。

二、William James 的實用主義觀點

William James 承襲了 Peirce 的理論爲基礎，將實用主義的概念發展爲成熟完整的一大哲學流派。他的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 與 *The Meaning of Truth* 三本書，使其思想突破了傳統的理論窠臼，他認爲真理在於它是否具有兌現（實踐）價值（cash value）、以及是否能真切地影響人類的生活。James 認爲心靈思想是一種功能，而非任何具體的活動、實體，或由特定材質與性質構成的事物。因此，他一面避開先驗觀念論，另一面避開唯物論（materialism），提出以「純粹經驗」（pure experience）作爲基礎的徹底經驗論。若以徹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經驗觀來看，意識在其最原始經驗與外在事物符應（correspondence）時，既不是先驗主義者認爲具有先天認知形式的主體，也不是呈現客體作用的印象集合，而是「主客體」之間的關係。純粹經驗只是單純的「意識到」（conscious of）或「想到」（thought-of），並未分化成具有具體內容或性質的事物，因而超越心物、主客的二元對立。意識（consciousness）是無分別的，分別源自於其所對應之物，這原則不只適用於感覺經驗，亦適用於概念（concepts）。事實上，概念與記憶（memories）開始也只是無分別的純粹經驗，後來在不同的狀況下，才有時被當作是客體，有時被當作是心理狀態，其實這些只是連續不絕的「意識到」。於是他主張純粹經驗的世界可以免於偏見，純粹經驗是構成世界最原始的質料，是超越主客、心物構成一切的元素（James, 1968: 170-171）。換言之，純粹經驗是沒有二元論的對立觀點、沒有偏見的，是知識論的根本。

James 認爲實用主義是化解哲學爭議的方法，傳統哲學因哲學家生而具有不同氣質（temperaments），而有柔順（the tender-minded）與固執（the tough-minded）之別，柔順哲學家以理性主義者爲代表，堅信抽象永恆之原理。固執哲學家則只相信事實，經驗論者是其代表。兩類哲學家中，柔順者根據理想視宇宙爲善，完美有價值；固執者根據世間事實，反對宗教，否定宇宙有價值。實用主義是較接近固執哲學，但它卻不反宗教；只是以實用原理爲哲學方法，試圖化解理性與經驗、宗教與科學、價值與事實之間的對立。「實用原理」是一種根據各種觀念產生的實用效果（practical consequences）以詮釋觀念意義，化解哲學爭議的方法（James, 1981: 31-32）。

他也認爲根據實用原理，沒有造成任何實際效果上不同的觀念，即是相同的觀念。如果哲學唯心論和唯物論在解釋「心」或「物」如何形成世界時，達到完全一致的結論，那此爭論就可以終止了。因爲「世界不可能有不會造成差異的不同，也不可能有不會造成具體事實差異、或在特定時地以特定方式造成不同行動後果的不同抽象真理。哲學的整個功能即在找出特定時刻，不同的世界方程式（world-formula）會對我們的生命造成何種的特定影響－如果該世界方程式爲真的話（James, 1981: 30）。」所以 James 認爲實用方法關切的不是特定的結論，而是一種態度導向，是一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遠離第一事物、原理、範疇、必然；迎向最後事物、結果、後果、事實的態度（James, 1981: 32）。」簡言之，實際效果是優先於原理（primacy of practice），效果決定了一切。

三、John Dewey 的實用主義觀點

Dewey 試圖探討傳統哲學中的許多二元論是否有實踐上的基礎，並能產生經驗上的效應，故而自稱其實用主義是「自然的經驗主義」（naturalistic empiricism），或「經驗的自然主義」（empirical naturalism）。經驗是指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發生互相影響的自然場所。自然場所的本質就是「問題情況」（problematic situation），因爲人類所面對的環境都是充滿問題的。在這種情形下，人們觀察和分析造成「問題情況」的種種原因，並嘗試改造環境（Dewey, 1933: 15-16；姜文閔譯，1992）。因此，人類思維具有工具性的意義。換言之，人類思維活動本身就是尋求解決問題狀況的工具。因此，所謂「真理」的意義（meaning）可藉著「效用」（utility）概念說明。即是凡具有效用的，就是真理。「真理」概念既是藉著效用概念說明，而效用又是指因應環境解決問題。由於人類所處的環境是在不斷變遷之中，而人類所面對的困境也隨時改變，沒有一種萬靈丹的解決方案，故方案也隨著環境的變遷而改變。由於真理只有工具意義，所以真理也不是絕對的，就是所謂「工具主義的真理觀」（the instrumentalist theory of truth）（Dewey, 1962；2000；郭博文，1982：51-79）。

Dewey 受到達爾文演化論思想的影響，強調演化（evolutionary）方法或源起（genetic）方法，也就是歷史（historic）方法，藉以顯示關係，以及確定與界定其意義。因爲按照達爾文「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原理，物種的變異是偶然的，但「自然選擇」的作用卻是必然的，只要發現物種的變異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適應關係，就可以解釋物種進化的原因，完全不需要預先的設計或心靈的作用等非科學的、不可驗證的解釋（Dewey, 1983: 3-14）。他認爲實驗就是源起方法，源起方法並非從前例衍生或演繹而來的結果，他以水爲例說明，只有在實驗中顯現出氧和氫化合成水的發生過程必要條件，才能科學地認識水的經驗存在（Dewey, 1902）。簡言之，源起方法就是探討個別事物源起的方法，探討個別事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爲經驗存在的方式與過程。

四、Richard Rorty 的實用主義觀點

不同上述三位實用主義學者，Rorty 是提出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的新實用主義者，較趨向於後現代主義的實用主義。他認爲，哲學並非像科學一樣致力於產生符應（correspond）真實（reality）的客觀描述，而是針對「我們要如何談事情」（how we talk）提出各種不同的「建議」（proposals）。換言之，作爲預設正確性或符應性的建議，哲學不是在「發現」（discover）真理；哲學不過是創造新的、有趣的、有用的思考方式思考一般事物（Rorty, 1992: 34）。真實總是在論述中被經驗、被建構的，而任何描述都只是發言者所選擇的隱喻。因此，只不過呈現了發言者難以理解和建構世界的角度。我們之所以不斷重寫歷史、重新描述（redescription）真實，所謂「重新描述」就是運用語言「將新的、不同的事物變得可能與重要」，重新描述使人們能擺脫「唯一正確的描述」（The One Right Description），而不再以爲世界上有所謂的唯一準則與標準答案。重新描述即在於開拓另類描述的空間，也就是以「自我創造」（self-creation）的隱喻取代「發現史實」的隱喻（一種難以理解的語言元素）（Rorty, 1989: 39-49；徐文瑞譯，1998）。簡言之，重新描述就是自我創造，不斷自我創造重新描述真實。

因此，知識世界不是關於弄清楚真實，而是獲得因應真實的行動習慣（Rorty, 1991: 1）。知識並不是心智與物體（mind and object）的關係，是運用說服而不是運用力量獲得同意（agreement）的能力（Rorty, 1991: 88）。Rorty 認爲理性主義者（如笛卡兒）和經驗主義者（如洛克）都使用同一個隱喻來描述人類的心靈與意識，即是我們的心靈本質就如同鏡面一樣，所謂意識或知識的形成皆是外在世界在此鏡面上的反映照射。他卻指出，這個隱喻是在一連串歷史的偶然中構成了哲學領域思考知識時所使用的最主要模式。這種「鏡面反映式的知識」（the spectorial account of knowledge）視主客體爲分離的兩個實體，知識則是客體反映在主體上的再現形象；以此二元知識論來看，有依據的知識（或真理）必然可以藉由知識與客觀世界之間的符應與否來認定。因此，他認爲這實際上是一種「再呈現的普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而已（Rorty, 1979: 3；李幼蒸譯，1994）。

Rorty 主張由於我們永遠無法跳出自己既有的信念與語言，而找到一個客觀的「上帝之眼的觀點」（God's-eye view），並以此判定我們的信念是否與客觀的事物符應一致，因此，任何所謂「驗證」（justification）並非檢驗「再呈現」的正確性（accuracy of representation），而是顯示某個「說法」是否能夠成功的幫助我們理解我們當下的信念，是如何勾連在一起的（hang together）。如此，理念之間的一致（coherence）就成了最重要的判準。他說：「驗證不再是信念（或語言)與事物之間的某種特殊觀係，而是對話（conversation），是社會實踐（Rorty, 1979: 170）」。他稱這種哲學爲「陶冶的或治療的哲學」（edifying or therapeutic philosophy），可以糾正在常識（sense）與科學（science）之間的無意義的爭執，但並不爲某對象的存在或不存在提供任何獨立的證據，其目的在「使對話持續而非發現真理」（Rorty, 1979: 373）。

因此，Rorty 強調「治療重述」（therapeutic redescription）的研究方法，此方法是以新方式重新描述許許多多事物，直到已經建立一個引起新興世代採用的語言行爲模式，其藉此追求適當新的非語言行爲模式，例如採用新科學設備或新社會制度（Rorty, 1989: 9）。誠如上述，重新描述在於開拓另類描述的空間，不再以爲世界上有所謂的唯一準則與標準答案。

證諸上述四位實用主義學者的觀點，可以發現在知識論與方法論上，實用的效果（問題）取向則是共同的主張，實用效果優先於知識原理與原則，理論與研究方法都是解決問題的工具，也是以實用效果作爲評估的基準，但即使都是實用主義者，仍是有其異同之處（詳見表 2）。總之，實用主義的多重觀點形成的真理共識論與實用效果取向，成爲其基本的（科學）哲學基礎。

隨著國際關係理論發展而有些學者嘗試從實用主義尋求哲學基礎，探索研究國際關係的理論與實務。不同的國際關係學者尋求不同的實用主義學者，而造成一股「重返實務」的風潮。然而，國際關係學者並不完全理解實用主義哲學，純粹是爲了避免國際關係理論的後設理論爭論，但卻又必須陷入其中爭論一番後，提出其強調國際關係理論實務效用的知識論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場。

表 2　實用主義哲學學者的知識論比較表

	Peirce	James	Dewey	Rorty
知識基礎論	反基礎論	反基礎論	反基礎論	反基礎論
真理共識論	行動實驗	實效效果	工具性效用	思考建議
經驗論	習慣經驗論	純粹經驗論	自然經驗論	社會實踐經驗論
真實（reality）觀	人類知覺法則科學研究而獲得共識的真實	經驗意識到的真實	演化的真實	重新描述的真實
研究方法	符號學、逆推法	符號學、逆推法	演化法、源起法	治療重述法

資料出處：作者整理

肆、實用（建構）主義的認定、知識論特質、優勢、多元研究方法與貢獻

事實上，國際關係研究已經逐漸有許多學者主張回歸基本（back to basics）或重返實務（return to practice or practice turn），或是要超越國際關係理論與實務之間的隔閡（Büger & Villumsen, 2007），無論是給予「實務」本體論立場（Pouliot, 2008），[11] 或是設定知識論基礎（Gadinger, 2006），

[11] Vincent Pouliot 以「實務性邏輯」（logic of practicality）賦予「實務」本體論的優先，補充「社會行動邏輯」（logic of social action）的三項邏輯：「後果性邏輯」（logic of consequences）、「適當性邏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與「論證邏輯」（logic of arguing），即是國際關係理性主義、建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理論，說明安全社群在建立和平的實務，即是安全官員的務實感使和平得以存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 或是運用方法論的多元研究方法（Jutersonke & Stucki, 2007），[13] 即是重新思考國際關係實務與理論的實踐，實用主義都是這些學者所依據的哲學主張。這股「重返實務」的風潮已經在國際關係學術研討會、期刊成爲一股新興的研究趨勢，例如在二〇〇七年五月十八至十九日，義大利的「歐洲大學中心」（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舉辦「（重新）返回實務：思考國際關係與安全研究實務研討會」（The (Re-)turn to Practice: Thinking Pract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Studies）（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07）；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二至十五日，第六屆泛歐洲國際關係研討會（the Sixth Pan-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第 13 場次就是「實用主義與國際關係」（Pragmat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又舉辦了「務實理性研討會」（Workshop on Practical Reason），探討實用主義在國際關係研究的作用與貢獻（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08）。

歷經十多年的努力，國際關係實用主義學者的確帶動了一股「實用主義轉向」，從引進實用主義哲學者（尤其是上述的學者）的知識論觀點，作爲國際關係理論的後設理論基礎，呈現其知識論的特質、相對優勢、研究方法與貢獻。

一、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學者的認定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如何認定那些學者是實用主義學者或是實用建構主義學者呢？除了自稱之外，例如 Kratochwil 是鼓吹實用主義的學者，Haas 父子直接自稱實用建構主義學者，又有什麼方法認定呢？要依據學者使用實用主義的特殊研究方法嗎？以逆推法爲例，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學者 Alexander Wendt (1987: 351-352；1999: 63)、John Ruggie (1989: 880)、Jeffrey

---

[12] Frank Gadinger (2006) 以 Bruno Latour 和 Karin Knorr Cetina 的社會實務（social practice）知識觀點，比較 David Campbell, Jutta Weldes, Ole Wæver, Bill McSweeney 和 Pinar Bilgin 的論述分析，觀察美國 911 事件後的安全論述聯盟與安全實務，說明美國藉由文明衝突論與自由聖戰的論述而恢復美國認同。

[13] Oliver Jutersonke and Philipp Stucki (2007) 嘗試連結內容分析法與論述研究途徑，進行國際關係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eckel (2001: 567)、Martha Finnemore (2003: 14)等人就偶爾運用此方法，是否就可以稱之爲實用建構主義學者嗎？還是應該以學者引述實用主義知識論觀點爲標準，較能認定學者是否是實用（建構）主義學者呢？Koran Michal 在指出實用主義的內在價值時，就以 Kratochwil 和 James Bohman 的科學哲學知識論觀點說明實用主義與科學實存論的差異，即前者是歷史制約的（conditioned）、有用的與實用的知識，後者是緊密與普遍真實（reality）相關聯的知識，作爲追蹤國際關係實用主義學者的參考（Michal, 2007）。因此，國際關係實用主義學者的認定標準在於其是否引用實用主義的知識論主張，而不是在於是否運用實用主義的研究方法。當然學者在運用研究方法時，若是引用實用主義的知識論主張，自然也就屬於實用主義學者。

二、國際關係實用主義理論的知識論特質

國際關係學者藉由吸收實用主義的觀點，而歸結出其認知的實用主義觀點而運用於國際關係理論與實務的研究。例如 Matthew Festenstein 認爲實用主義有四項承諾：整體主義（holism）、易誤主義（fallibilism）、反懷疑主義（anti-scepticism）與實務（實踐）優先（primacy of practice）（Festenstein, 2002）。即是實用主義基於堅決承認易誤主義和偶發性（contingency）與對話，而提倡方法論多元主義與學科寬容；鼓勵多重觀點的探究類型，而受益於不同世界政治觀點之間的互補而非對立（The Editors, 2002: iii）。Minna Jokela 則認爲實用主義是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重要靈感（inspiration）來源，實用主義是一個以行爲主體與實踐爲基礎，問題爲取向的研究途徑，聚焦於行爲者在國際關係行爲者性（actorness）的經驗（Jokela, 2008）。簡言之，實用主義是一種務實態度或立場（pragmatic attitude or stance），就是研究者選擇各種理論或技術，是依其手中研究或狀況的特定主題（topics）而定，而不是依一個相當連貫的哲學或理論而定（Baert & Brighi, 2008: 49）。

依 Jorg Friedrichs 和 Friedrich Kratochwil (2009) 解構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理論的標準方法論，即是本體論的實存論與知識論的真理符應論，也就是假定存在客觀的外在世界，理論與真理是符應一致的；而重構爲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共識論與知識工具論，即是 Rogier De Langhe 等人主張實用主義的科學（國際關係理論）解釋是多元性的，並沒有固定的解釋價值，解釋的價值依其所要解答的問題而定，即是各理論（模型）的解釋力量是依研究資料（data）與研究者的知識旨趣（epistemic interests）而定（De Langhe et al., 2007）。這清楚地道出了實用建構主義的知識論特質，即是以問題爲研究導向，而不是以理論爲導向，理論的解釋力在於如何回答研究問題。

總之，國際關係實用主義理論學者引進實用主義是要呈現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知識論多元觀點，藉由強調實務與問題取向的理論特質，而突破後現代（結構）主義理論所造成的國際關係理論知識論僵局，尤其是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爭論也是有待突破。

三、國際關係實用主義的知識論相對優勢

國際關係實用主義學者認爲，在知識論及方法論上，實用主義比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具有相對優勢，包括理解社會行動的意義、歷史敘述與詮釋的豐富性、促進國際關係學者的對話。例如 Molly Cochran 比較分析 Max Weber、Ludwig Wittgenstein、Jurgen Habermas 和 John Dewey 的哲學觀，從 Dewey 的實用主義發展後實證社會科學的國際關係，Dewey 的知識論與民主多元科學方法反映其對「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的正確認知，更能理解社會行動的意義（Cochran, 2002）。Jonathan B. Isacoff 在分析比較實證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觀點後，認爲 Dewey 實用主義超越了前兩者，因爲 Dewey 認爲歷史知識是社會建構而來，不僅提供歷史研究更有用的研究方式，也恢復國際關係有效參與改善公益（public good）的能力。實用主義認爲藉由人類經驗公開形成的人類知識，能以將意義（meaning）歸因於人類存在而相互主觀地分享，因此關於本體論與知識論的事務，實用主義重視「（研究）社群共識」（consensus of community）而不是後現代主義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或實證主義的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總之，實用主義依據可以提供研究仲裁機制的相互主觀性（而不是符應一個客觀的實體），而提供一個以共識爲基礎的研究知識論，進入人類經驗的現在與過去，重新建構歷史事件，擴張可能的歷史詮釋的範圍，與體認歷史敘述（narratives）的豐富性與多元性。歷史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識是經由探索者「同意所同意的」（agree to agree）探索主題的基本概要，並形成關於進行建構知識最佳過程的共識（Isacoff, 2002）。甚至 Gunther Hellmann 批評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常以典範主義（paradigmatism）的「不可共同測量性」（imcommensurability）區分不同理論之間的界線，但實際並沒有獨立客觀的標準測量典範之間的共同測量性，更別說要如何適當的區分界線了。如此一來，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與綜合也就不可能了。因此，他遂引實用主義說明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與綜合是在達成做什麼的協議，而不是在特殊的真理價值（Hellmann, 2003）。

簡言之，實用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上，其知識論的相對優勢在於強調理論與實踐，以及學術社群的共識，使國際關係理論落實在有用的好理論（useful and good theories），好理論即在於有用，而不是在虛無的語言或論述，或是追求真理價值。

四、國際關係實用主義的多元研究方法

國際關係實用主義學者起初並未明確指出其研究方法，而是以實用主義的知識論主張爲重點，藉以突破第三次大辯論的知識論僵局。在方法論上，也以實用主義主張的多元主義（pluralism）與問題取向爲依據。因此，國際關係實用主義學者就較爲強調知識論而忽視方法論。即使有些國際關係學者運用實用主義的研究方法（例如逆推法、符號學）進行個案研究，或是作爲理論論述依據，也不會自稱是運用實用主義研究方法。直到「實用主義轉向」受到國際關係學界的重視，遂有國際關係實用主義學者才開始道出其研究方法是依據實用主義哲學而來，進而有國際關係實用主義學者探討實用主義的研究策略與方法。國際關係實用主義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論綜合、分析折衷與逆推法（Friedrichs & Kratochwil, 2009: 707-711），[14] 還有 Rorty 的治療重述法（Deibert, 1997）、Dewey 歷史撰述法（historiography）

[14] 理論綜合是運用競爭測試（competitive testing）、適用範圍（domain of application）、階段序列（sequencing）、包含（incorporation or subsumption）、對話與動態（反覆）序列（dynamic or iterative sequence）的方法，綜合不同的理論觀點理解或解釋眞實。競爭測試是指就特定事件的解釋相互競爭；適用範圍是指考量各理論適用的範圍，選擇適合的理論解釋適用的部份，而共同組成完整的解釋；階段序列（sequencing）是指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sacoff, 2006）與 Peirce 的符號學法（Kangas, 2009）。總之，實用主義哲學家提出的研究方法都是國際關係實用主義的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理論綜合與分析折衷，兩者是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在研究實務與經驗上，依據實用主義知識論觀點所發展出來的研究方法，強調國際生活實質問題不同研究傳統（理論）之間有意義的對話，以及反思國際關係行爲者相關政策與規範辯論的實用價值（Kratzenstein & Sil, 2008: 111）。

誠如 Finnemore 和 Sikkink 所言：沒有單一的建構主義方法或研究設計，建構主義開放了一套的議題，而學者選擇最適合他們特定問題的研究工具與方法（Finnemore & Sikkink, 2001: 396）。即使是運用量化測量的工具與方法，也不是對立於建構主義，建構主義學者也是可以有效地運用統計證據描述與分析語言的特質與模式，只要這些數據仍對社會經濟系絡有所關鍵就可以運用統計證據（Klotz & Lynch, 2007: 108）。換言之，建構主義並沒有主張特定的研究方法，或是限定只能使用一種研究方法，而是混合運用各種研究方法。Antje Wiener 就以建構主義理論化的馬賽克（mosaic of constructivist theorizing）嘗試說明不同知識論立場的建構主義在探索國際規範性質的整合，以及建構主義與國際法之間的科際整合研究（Wiener, 2006）。Finnemore and Sikkink 分析建構主義學者的研究方法後，指出建構主義與當前社會科學和政治學所使用的方法是相容的，建構主義的特點在於其理論主張而不是其經驗研究的策略（Finnemore & Sikkink, 2001）。這種強調多元方法的觀點，也正成爲建構主義內部建橋計畫的重點（莫大華，2006a；2009）。

量各理論解釋序列行動中的特定階段或步驟，選擇適合的理論解釋適用的階段，而共同組成完整的解釋；包含是指一個理論包含於或吸納另一個理論；對話是理論綜合的前提，它承認其他理論的地位與效用，並理解本身的效用與弱點；動態（反覆）序列是衍伸自序列策略，序列可以是動態的、反覆的序列，依據行爲主體與結構的動態過程而重複步驟（Jupille et al., 2003；Tierney & Weaver, 2005: 16-24）。分析折衷是主張學者能共同運用各種不同的理論觀點理解複雜的各種眞實，即認爲國際關係各理論都是分析架構，皆有其侷限性，學者可以靈活運用，共同構成對問題的理論解釋（Tierney & Weaver, 2005；Kratzenstein & Sil, 2004: 1-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國際關係實用主義的貢獻

實用主義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可能貢獻，可以分爲在知識論、研究方法、研究取向與政策相關性等等，顯現實用主義與國際關係理論的密切關係，藉以顯現實用主義的知識論立場對國際關係研究的貢獻。

在知識論的貢獻上，實用主義使國際關係強調務實的知識，避免不必要的知識難題。例如 James Bohman 認爲實用主義與批判理論都是務實知識的社會理論，批判理論提供了較佳的實踐（praxis）說明，並且在此基礎上較佳說明了引導作爲人類行爲學（praxeology）的國際關係理論務實的知識。在發展提供實踐的務實知識的社會科學上，最好提供一個批判社會研究的實用詮釋，也就是以實用主義的方法論多元主義協助批判理論變得更務實，藉由「多重觀點的理論」（multiperspectival theory）務實地綜合實用主義與批判理論，而發展出務實的社會科學，務實批判的國際關係（a practical-critical IR）（Bohman, 2002）。Harry Bauer 和 Elisabetta Brighi 認爲，第一，在知識論上實用主義可以提供堅實的基礎，以重新開展一個取代國際關係建構主義陰影（penumbra）的另類觀點。因爲實用主義的反基礎論與反質疑論的知識論立場，藉由主張國際關係放棄其無法承擔與不應追求的知識論純度，而專注於研究實務與有問題的狀況，而可以解除過去數十年使國際關係癱瘓的知識論緊張關係與二分法。第二，實用主義強調了國際關係極度需要的破除迷信（iconoclasm），藉由各種相互競爭的觀點之間的科際整合、實驗與對話，較不重視學科界線，省去瑣碎的哲學而進行折衷的探究（eclectic inquiry），提供優質的創意、反思與想像。最後，實用主義提醒了國際關係所遺忘的倫理、政治與規範的志業(Bauer & Brighi, 2009b: 2）。即是以實踐行動爲國際關係知識論的起點，從實踐獲得知識；恢復國際關係成爲科學的潛力，並評定科學是一種社會活動；科學知識是在國際關係實踐社群內建構而成，是持續不斷而沒有終止，是暫時的、歷史偶然的，社會結構、條件與規則使國際關係科學知識有新方向，並以客觀化觀察理解國際關係實務的肌理（texture），以及反思國際關係實務者相互主觀的理性化，思考此觀察所運用的概念工具（Friedrichs & Kratochwil, 2009: 711-7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研究方法的貢獻上，實用主義使國際關係研究方法多元與整合。實用主義是一種實用哲學形式，以其方法論多元主義與務實推理（reasoning）爲特質（Owen, 2002）。誠如上述，國際關係實用主義學者運用實用主義哲學學者提出的研究方法外，Jorg Friedrichs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更以理論綜合、分析折衷與逆推法等三種方法說明實用建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並以 Friederichs 的 *Fighting Terrorism and Drugs: Europ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e Cooperation* 爲例說明逆推法的運用過程（Friedrichs & Kratochwil, 2009: 723-724）。理論綜合與分析折衷更顯現實用主義研究方法的多元與整合，不僅是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與替代理論（建構主義)之間，也在各理論內部不同的類型之間，皆可以依據不同的綜合或折衷策略予以整合，強化國際關係理論的實用效果。

在研究取向的貢獻上，實用主義使國際關係研究取向以問題爲基礎。例如 David Owen 認爲由於哲學與理論辯論使國際關係學科認同出現問題，造成過於重視理論而忽略實務（theoreticism）而沒有穩定的學科取向思考其非常分離的研究途徑、理論與方法，以及帶來有生產力的對話，遂以 Dewey 實用主義爲國際關係學科重新定向，藉由以問題爲基礎的聚焦於統治（government）與治理（governance）議題，而混合客觀性和參與（engagement）成爲程序的（processual）而非目的論的學科取向，使國際關係學科內部的各種不同立場能參與進行有生產力的對話，進而體認與支持其差異性，因而國際關係學者爲持有效的國際關係社群的歸屬感（Owen, 2002）。Peter M. Haas 和 Ernst B. Haas 的實用建構主義避開主要國際關係理論的本體論差異，而強調人類意識在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的角色，以及研究與依賴「真理共識論」支持詮釋與解釋此真實，只有經由典範間的中層討論，試著解決對相同現象的不同詮釋。即是獲取真理的方法是藉由理論者與實務者之間持續對話而成爲有共識的真理，遂以國際制度爲例提供方法論的指導大綱（Haas & Haas, 2009）。甚至，Anni Kangas 特別運用 Pierce 的符號學理論並以後現代主義經常使用的研究材料－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探索實用主義重視實務的貢獻，可以避免國際政治現象的化約主義，而能提供多面向的解釋（Kangas, 2009）。

在政策相關性上的貢獻，Wesley W. Widmaier 認爲 Robert W. Cox 將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際關係理論辯論區分解決問題（problem-solution）的理論與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前者適合於短期，後者適合於長期的社會結構演化。這樣的區分會妨礙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而呼籲要以實用建構主義結合批判理論分析政策的長期可能性與短期現行政策，而使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能提供更持續地參與公共辯論（Widmaier, 2004）。換言之，實用建構主義試圖將建構主義引導爲較具社會實踐意涵的國際關係理論，希望脫離過分形而上或後設理論的研究，能落實在政策實務之上。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在本體論層次上，實用主義藉由完全避開本體論而提出解決實證國際關係理論與建構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在知識論層次上，藉由要求理論概念應該有用（work）而非一致（coherence），以正當化（legitimize）其用途（use）（Teti & Hynek, 2007: 19），即是「真理共識論」（a 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的知識論立場。在方法論上，則是以民主的多元研究方法，鼓勵對話與尋求共識。換言之，第一，實用主義的主要特質是其本體論的不可知論（agnosticism），實用主義作爲激進的經驗主義，反對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本體實存論，認爲只有語言使「真實」有所意義，這使實證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基礎論站不住腳。第二，實用主義反對探索「本質」問題，因爲這是依賴系絡的（context-dependent）、主觀的、有計畫的，也由於真理是依賴系絡的，而且系絡會改變，也就沒有「永恆智慧」（timeless wisdom），因爲所謂的「智慧」是偶然的（contingent），因此信奉實用主義會逐漸損害「真理符應理論」（a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主張的基礎（即是命題的真僞取決是否符合於事實），或權力、無政府狀態的「真正」性質。第三，實用主義明顯地反對實證社會科學是較優秀的（superior）知識（Teti & Hynek, 2007: 20-21）。這清清楚楚地道出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的知識論立場與主張，是截然不同於國際關係的主流理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也不同於建構主義內部的主流類型（現代建構主義）的知識論。

由此可知，當視國際關係爲一個科學的實踐時，它也就是由不同的實踐領域所構成的文化（Büger, 2007）。準此觀點，實用主義已經成爲國際關係學者用以反對國際關係實證主義理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最佳哲學觀點。尤其同樣地，有些國際關係建構主義者也以實用主義作爲反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建構主義內部以實證主義作爲知識論建構主義，尤其是科學實存論（以 Wendt 爲主）的建構主義，這更使得實用主義成爲建構主義內部另一股重要的哲學觀點。[15] 例如 Jorg Friedrichs 就認爲建構主義選擇科學的實用主義作爲後設理論立場，是可以比選擇實證主義更能調和一致（Friedrichs, 2004: 122-123）。因此，有必要就分析比較幾位實用建構主義學者，以進一步顯現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的知識論立場與主張。

伍、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比較 —Adler、Kratochwil 和 Haas 父子

實用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主張雖是大致相同，仍是有些許的程度差異。誠如上述，國際關係實用主義學者的認定標準在於其是否引用實用主義的知識論主張，而不是在於是否運用實用主義的研究方法。因此根據 John G. Ruggie 的建構主義分類，運用實用主義的建構主義即是其所指稱的「新古典建構主義」，它包含了實用主義的知識論，達成相互主觀意義所必須的分析工具，言語行動理論（speech act theory），溝通行動理論，如同在 Searle 著作中的通則，或演化的知識論，以及承諾於社會科學的理念。屬於這類的建構主義學者有 Ruggie 本人、Ernst Haas、Peter Haas、Kratochwil、Nicholas Onuf、Emanuel Alder、Martha Finnemore、Katzenstein、Jean Elshtain 等人（Ruggie, 1999: 240-242）。運用實用主義的建構主義也是 Xavier Guillaume 所稱的「規範建構主義」（Guillaume, 2005），本文皆以實用建構主義稱之，這是 Peter M. Haas 和 Ernst B. Haas 自稱用語，基於容易理解與便利之故，本文統稱爲實用建構主義。在選擇實用建構主義學者進行比較分析上，是依據上述 Ruggie 指出的學者，以及該學者對於實用建構主義發展的影響而選定，其中以 Adler 與 Kratochwil 爲主要焦點，因爲 Adler 認爲實用主義是建構主義的哲學基礎，其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y）

[15] 簡略而言，建構主義內部重要的哲學基礎觀點有主流的科學實存論，以及非主流的實用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則是更爲邊緣化的哲學觀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概念與追求建構主義中間地帶（middle ground）更是充滿實用主義的色彩；Kratochwil 則是因爲其以實用主義批評科學實存論，而引發科學實存論學者的爭論，以及其強調國際規範的重要性；Haas 父子則是自稱實用建構主義，是較早採用實用主義的建構主義學者。其他值得關注的建構主義學者 Rudra Sil and Peter J. Katzenstein，以實用主義作爲其「分析折衷主義」（analytic eclecticism）的知識論立場，藉以理論綜合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增強對實質問題的理解（Sil & Katzenstein, 2005）。

一、Emanuel Adler 的實用建構主義觀點

在 Adler 的著作中，引述 Dewey、James 與 Peirce 的觀點，指出隨著經驗開展而需要調整對真理的看法（Adler, 2002: 97；2005: 97）。Adler 認爲實用主義是建構主義的科學哲學基礎，尤其是建構主義的社會學研究途徑是與實用主義相符（Adler, 1997: 328-329）。他認爲建構主義是嘗試在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與詮釋主義之間建立溝通橋樑，它是理性主義與相對（詮釋）主義之間真正的中間地帶，因爲在本體論上它立基於物質主義與理念主義、個別的行爲主體與社會結構的雙交會口；在知識論上是相互主觀（詮釋）的意涵，在科學哲學上是實用主義。他以集體理解的認知演化（cognitive evolution）理論詮釋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認知演化是指社會世界建立社會事實的方式，與社會事實運用影響力的方式有關，因此，歷史過程中的任何一個時空，社會事實是由物質世界與社會世界的集體理解所社會建構的。認知演化理論是一個國際學習的理論，能使建構主義以經驗研究爲取向，他希望建構主義能重新發現如何將理性考量帶入集體的人類事務上（Adler, 1997）。

對於建構主義內部分歧的問題，Adler 認爲實用（主義）的實存論（pragmatic realism）提供了鞏固建構主義內部共同基礎的一個方法，建構主義內應該建立一致的方法論基礎，並減緩其知識論與本體論的爭論而集中於建立實質理論，加強發展其細部的基礎（micro-foundations），例如理解個體與社會結構之間關係及過程的社會機制（social mechanism），以及重視建構主義的實踐結果與政治結果，強調科際整合研究（例如國際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社會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複雜理論)（Adler, 2002: 28, 109-111）。Adler 認爲方法論是建構主義理論與研究中主要的遺失連結（missing link），發展一致的方法論基礎決定了建構主義對國際關係研究的深刻影響，此一致的方法論基礎是要發展務實的替代方案，而非模仿自然科學。此一致的方法論即是演進的途徑（evolutionary approach），包括所謂「過去經驗教訓」（lessons of the past）的敘述，以及「建立想定」（building scenarios），其基礎主要是社會事實的歷史重建爲中心，以詮釋敘述、實務與論述爲基礎，不在預測而在解釋過去與現在的事件、實務與利益如何成爲可能，以及爲什麼發生在其發生的時空（Adler, 2002: 109）。簡言之，就是從本質（being）到形成（becoming）的認知演進（cognitive evolution）過程，而能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與 Wendt 的方法論整體主義（Adler, 2005: 31-88）。

二、Friedrich Kratochwil 的實用建構主義觀點

Kratochwil 質疑 Wendt 對科學實存論的解釋是否適當，以及質疑 Wendt 的科學實存論能否作爲建構主義的後設理論取向，批評 Wendt 以科學實存論連結建構主義，他認爲這兩者是不相容的，而且 Wendt 是用大多數科學實存論者早已丟棄的科學概念堆砌，這是一個失敗的「婚姻」。更以塗鴉（scrabble）遊戲作爲隱喻通則化知識與建構主義挑戰的困境，認爲是不需要中間道路，也是不需要新的正統理論（Kratochwil, 2006: 21-47）。他認爲知識論與本體論並不是相互獨立，但藉由論述的語言（概念）結構而緊密連結，知識不應只有一個致知（knowing）方法，尤其因爲即使在科學內仍存有許多不同的依據，因此不能歸併成只有一個（科學實存論）基準（Kratochwil, 2006: 73）。因此，Kratochwil 以實用主義作爲依據基準，發展其知識論的主張而反對科學實存論以本體論爲先的主張。在他的著作中，引述 Rorty、James、Deway、Putnam 與 Pierce 的實用主義哲學觀點，是指以行動（acting）作爲知識推論的開始，而不是以理性本身或存在（being）或思考（speculation）（Kratochwil, 2007b；2007c；2007d；2007e: 496；2009: 18-19；Friedrichs & Kratochwil, 2009: 707, 715），但 Kratochwil 並未因爲他的「反基礎論」立場，而認爲無法發展出「科學的知識」或「具有充分證據的知識」（warranted knowledge），而是可以藉由真正的科學實踐（actu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ractice of science）或「（科學）社群的實踐」（communal practice）發展（Kratochwil, 2007a: 25-54）。他和 Jorg Friedrichs 提出以 Peirce 的逆推法爲基礎的實用（建構）主義的研究方法（策略），以呈現實用主義研究的有用實踐方法。其研究策略奠基於七項原則：(1) 研究目的必須公開；(2) 一個相關領域的研究取向比因果理論化重要；(3) 實用研究主要是由概念構成而不是由理論構成；(4) 概念的區別應該引出異同的型態；(5) 抽樣個案可以依據最重要或最典型的個案想定選定；(6) 適當的形式工具可以降低複雜性；(7) 逆推法最終是與因果理論化相容的（Friedrichs & Kratochwil, 2009: 714-720）。

Kratochwil 認爲傳統的知識論不是虛無主義者就是吹牛者，希望在傳統知識論失敗之後，仍關注其引發的後設理論議題重要性，以實用主義作爲社會分析與理論建構的途徑，會是一項好賭注（a good bet）。他以康德的「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真理理論」說明其觀點，第一，由於概念不是經由某種反映事物而作用，它們是論述的（discursive），而不是辯證的或直覺的；第二，知識也不是只限於因果性地連結現象，而是還有組成性地連結；第三，由於經驗事物不是只存在於外在世界，也是我們建構與利益的結果，概念形成與理論主張是未曾可以化約成只是推論的議題。他總結康德聚焦於客觀知識的必要條件，此客觀性不再奠基於本體論而是作爲知識主體的先決（a priori）條件之功能（Kratochwil, 2007c: 1-11）。

他進而提出實用主義作爲突破傳統知識論不是虛無主義者就是吹牛者的僵局，其理由有：第一，實用主義不是以事物（things）或理性或思想爲起點，而是以「行動」（acting）爲起點，避免了某些虛假的開始；第二，實用主義放棄有充分依據的知識是經由外在世界的邏輯展示或是再呈現而形成的觀點，它的起點慎重地採取科學知識的初步特質，也以較爲一致的方式說明累積的知識；第三，實用主義承認科學作爲一個知識生產的過程，它是由規則所決定的社會實踐；第四，真實已經成爲與社會實踐一致的遵循規則之過程意涵，這些規則並不決定後果而是限制與促使我們的活動，並允許我們繼續行動；第五，遵循規則並不是單單造成一個固定樣板的多重複製，而是規則提供我們在新狀況的方向，使我們在做正確主張時能調適變與常；第六，強調語意與社會結構的相互依賴。總之，Kratochwil 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一致的實用主義研究途徑強調以規則爲基礎的知識成長之相互主觀和關鍵本質，這是不能化約成一個具體的科學家團體之既有共識，或是前提含糊且仍未受檢的結果之效用（Kratochwil, 2007c: 11-13）。這是他與其他實用建構主義學者不同的地方，而是較爲強調社會結構而非知識社群的行爲主體。

三、Peter Haas 和 Ernst Haas 的實用建構主義觀點

在 Haas 父子的著作中，整體概述了實用主義的知識論觀點（Haas & Haas, 2002a: 240-242, 245；2009: 123），[16] 主要引述了 Rorty 的觀點，但只是以參考註釋指出 Rorty 的觀點（Haas & Haas, 2009: 115）。Haas 和 Haas 認爲實用建構主義可以引發有用的「中層真理」（mid-level truths）而沒有落入苦惱於無法解決的哲學、本體論與知識論的辯論，這些辯論是因爲當前的國際關係研究受到沒有必要的二分用語折磨所致，例如表意的（ideographic）與律理的（nomothetic）研究、解釋與理解、實證主義與反思主義。他們相信實用建構主義提供了避免這些強加一致的研究限制，實用建構主義的特徵是真理的共識理論，真理是由理論者與實務者之間持續的對話而成爲共識所形成。在本體論與知識論上，確定真理並不是如實證主義者與科學實存論者所要求的那麼絕對，也不像相對主義者主張的那麼偏見、屈服於某人的宰制，或是那麼霸權。實用建構主義尋求將政治理念與世界理念置於其所出現的或被建構的而來的社會條件之內（Haas & Haas, 2002b: 254）。

他們認爲實用建構主義對知識論的貢獻在於其因果性概念、真理共識論與演進知識論：一、實用建構主義避開任何易脆的因果性，而認爲任何真理都是暫時的。二、依據發展真理主張所適當的知識論技術，區分三種知識的領域：自然（brute）事實、社會事實與混合（hybrid）事實，自然事實是自然科學的傳統領域，因爲其必須由政治行爲者淋漓盡致運用各種

[16] 他們在文中直接論述實用主義的知識論觀點，但在注釋中指出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學者，除了本文提及的學者外，竟然還包括 Jurgen Habermas 與 Paul Ricoeur，即使 Habermas 轉述了許多實用主義學者觀點，他仍屬於批判理論，而 Ricoeur 屬於後現代理論，這也說明了他們的誤解此二人在哲學界的定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競爭的詮釋，並不能直接作爲行動的指南，發展對自然事實的共識，是在提升有關物理世界的知識。社會事實是關於社會生活的陳述，它大都源自觀察者的思想；是慣用於描述與詮釋政治事件與行爲的各種概念，是依賴系絡的與有爭論的，普遍存在於論述的領域，但從未達到自然科學的地位。混合事實是混雜自然事實與社會事實，常是專家有信心依據其對自然事實的精通而對社會事實做出結論。在使用混合事實時，是運用行爲者早已共享的辭彙，而獲得（整體）系絡的詮釋。三、演進知識論爲社會科學累積有關混合事實的知識提供了動力，以及提供社會科學家對上述三種知識領域的回饋機制（Haas & Haas, 2002b: 588-591）。

他們以國際制度爲例說明實用建構主義，認爲國際制度是學者社群共同知識承諾的結果，而出現共識的場域，它爲進行適當論述提供了接納的與支持的環境，即使沒有發現可接受的真理符應論，仍能展望一個有說服力的共識建立過程，進而提升較好的社會科學研究與較好的政策（Haas & Haas, 2002b: 595-601）。

總結而言，這些實用建構主義學者企圖避開國際關係理論的本體論爭論，而以實用主義作爲其建構主義的知識論主張，並以真理共識論作爲基礎，注重務實的推理與實踐，鼓勵方法論的多元，強調解決問題的實際效用。綜合四位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學者的知識論主張（如表3），可以發現四位學者只是選擇性部分引用實用主義哲學作爲其知識論觀點，藉以推動其國際關係的實用主義知識論，即是在實用主義的知識論之內，這些實用建構主義的知識論差異是較小的，其間的知識論差異是在 Kratochwil 重視規則取向的社會實踐，Haas 父子與 Adler 是較爲相近，或許是因爲 Kratochwil 較爲熟知哲學，[17] 他甚至以康德爲知識論基礎。就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爭論，Adler 是從實用實存論的方法論（研究方法）處理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爭論，這是他獨特的地方。隨著國際關係理論的「實用主義轉向」，實用建構主義理論必然也會在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爭論引起一陣風潮，尤其是 Kratochwil 似乎已經成爲這股風潮的代表，他既挑戰

[17] 他是以整體論述而較少個別論述實用主義哲學的內容，而多是以參考注釋呈現。反而是在探討規則的重要性與影響時，較詳細論述 Pierce 和 Dewey 的哲學觀點。此外，他重視 Peirce 的逆推法，因而較爲詳述此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流建構主義的科學（批判）實存論，也積極推動實用建構主義的理論，尤其他引述了較多的實用主義哲學學者著作。實用建構主義的未來發展前景如何，即是其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其所作出的回應，是值得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學者關注的重要議題。

表 3　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學者的知識論比較表

	Adler	Kratochwil	Haas and Haas
知識基礎論	反基礎論	反基礎論	反基礎論
真理論	真理共識論	真理共識論	真理共識論
真理共識所在	知識社群	規則取向的社會實踐	知識社群
知識論	演進知識論	論述知識論	演進知識論
建構主義內部知識論爭論	尋求一致的方法論（研究方法）	知識論對話與實踐	知識社群共識
實用主義哲學主要來源	Dewey, James	Rorty, James, Deway, Putnam, Peirce	Rorty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陸、對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的檢討

綜合上述，爲深度理解實用建構主義的知識論對於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甚至是整體的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影響，以及國際關係理論的回歸基本與重返實務的原因與主張，個人認爲實用建構主義將面臨以下幾項的挑戰，其中包括實用主義的知識論基本主張與地位、實用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運用、實用建構主義知識論在建構主義內部爭論，以及實用建構主義知識論優勢等層面的挑戰。

一、實用主義的知識論基本主張與地位的挑戰

國際關係學者何以選擇實用主義作爲國際關係理論回歸基本與重返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務的哲學理論？依據 Richard J. Bernstein 的研究，認爲實用主義有六項共同特質：第一，強調實務後果：務實地評估知識價值與道德價值；第二，易誤主義（fallibilism）：每項認知的、道德的、美學的主張都應開放接受質問；第三，強調人類生活的社會本質：心智與自我來自於與社會其他成員批判且有創造的對話；第四，反（知識）基礎論：知識主張沒有堅實的支撐點可以作爲基礎；第五，偶然性（contingency）：世界不是由上帝或人類所先行決定（pre-determined），而且世界的擴展是不可避免的；第六，多元主義：對特定問題的多重觀點有助於解決此特定問題（Bernstein, 1992: 326-329）。這是引用實用主義知識論主張的國際關係學者所必須理解的基本，但不同的實用主義哲學學者有其不同主張，尤其是實用主義雖主張「反知識論」的觀點，但這主張在哲學研究領域也引發諸多爭論。其次，應該探究實用主義哲學學者的論點差異（例如 Rorty 的新實用主義），以作爲理解爲什麼國際關係學者大多選擇 Dewey 和 James 的觀點，而有不同的實用建構主義的知識論之差異？甚至實用主義是否真能作爲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知識論基礎。例如 Helena Rytovuori-Apunen 認爲 Dewey 的實用主義無助於解決與超越當前以語言轉向（即後現代主義與批判理論）的知識論與方法論解決方案，而偏好 Peirce 的符號學三性論（Rytovuori-Apunen, 2005）。有些學者則是致力於引進美國以外的實用主義學者觀點，例如 Iver B. Neumann 引進法國實用主義學者 Michael de Certeau (Neumann, 2008: 82-99)，de Certeau 強調行動實踐的理論，重視實踐的運作方式（ways of operating）或做事情（doing things）的方式、策略（strategy）與計策（tactics），以及力量關係（force relationship），力量關係的計算稱爲策略，它是建立在一個專有的（proper）空間；計策則無專有空間，也不需要用邊界將他者予以區別，計策是進入他人空間使其成爲其中一部分，不接管也不離開該空間。他以希臘字 *merit* 論述其行動實踐理論，即是以最少力量獲致最多數量的效果（obtain the maximum number of effects from the minimum force）（Certeau, 1974）。

但是誠如 David Owen 的主張，實用主義是要促進國際關係理論不同學派之間有生產力的對話（Owen, 2002）。務實的推理是實用主義的基本共同知識論主張，即使國際關係引用的實用主義學者不同，但其間的差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不會構成相互敵對的阻礙，反而是相互的增強，特別是在國際關係議題與問題的研究上，更能避免「重理論輕實務」（theoreticism）的缺點，尤其實用主義的知識論強調對話而不是在探究真理。其次，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應該以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y）的知識論地位看待實用主義，藉以綜合不同理論之間的觀點，以及整合理論與實踐行動之間的差距。例如 Johan Eriksson 和 Giampiero Giacomello 即是以這樣的觀點，整合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藉以理解資訊科技革命對安全的影響（Eriksson & Giacomello, 2006）。簡言之，實用建構主義知識論的基本主張，正隨著引述不同的實用主義哲學而出現更強調實質問題與實踐行動的觀點。不僅如此，當前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正在進行的「建橋計劃」（bridge-building project）也是呈現出這樣觀點，或許這些建構主義學者並不盡然都是實用建構主義學者，但某種程度上，是基於實用的觀點而主張。

二、實用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運用的挑戰

國際關係理論出現主張回歸基本或重返實務，或是要超越國際關係理論與實務之間的隔閡，於是學者給予「實務」本體論立場，或是設定知識論基礎，或是運用方法論的多元研究方法，重新思考國際關係實務與理論的實踐，都是以實用主義作爲其知識論的哲學基礎。這樣的反思論點是要避免國際關係沒有意義的後設理論爭論，其他國際關係學者的反應或批評並不是沒有，但實用主義就是意圖藉由實務運用的務實結果，彰顯其對國際關係研究的貢獻。

例如 Harry Bauer 和 Elisabetta Brighi 認爲應該探究實用主義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關聯，包括：第一，探索實用主義對早期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影響，有助於更理解國際關係學科的知識史，以及發現由於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中各種競爭的理論所被忽略與複雜的實用主義故事。第二，探究實用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的軌跡（trajectory），尤其是早已存在國際關係受到實用主義影響的理論概念與方法，廣泛理解實用主義將有助於這些概念與方法在國際關係研究的運用，以及不同學者、不同理論陣營、不同理論與方法論傾向之間的對話。第三，探究實用主義的知識論與倫理層面，而有助於克服「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社會人」（homo socioloicu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間人類行爲主體性（human agency）的停滯（Bauer & Brighi, 2009c: 169-170）。當然，實用建構主義是希望避免國際關係理論過於重視後設理論的爭論，而忽視國際關係理論的實務運用。因爲實用主義認爲國際關係理論是一種實務哲學的型式，取向於人性（humanity）共同事務或公共事務的管理（government），而更能接受國際關係理論的多元（Owen, 2002: 664-669）。因此，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理論綜合與分析折衷的主張即是展現實用主義的實務運用（莫大華，2006b）。

至於相關批評，例如在知識論上，由於實用建構主義者未能從其知識議題批判地反省知識所在，以及想通其知識主張的政治意涵與倫理意涵，所以他們逃避其政治效應的責任（Locher & Prugl, 2001: 121）。另外，Thierry Balzacq 也認爲說實用主義是趨勢，這是錯誤的稱述，將實用主義轉型進入國際關係也是尚未完全，有必要進行掌握與評估其對國際關係研究的衝擊（Balzacq, 2005）。但最直接的是 Nuno P. Moteiro 和 Keven G. Ruby 的批評，他們認爲實用主義主張的真理共識論本身就是一種知識基礎論，遂質疑實用主義能解決國際關係知識論爭論，也不認爲這爭論可以解決，即使國際關係擁有了知識基礎也不代表其是較科學的，其學術是與實務較相關（Moteiro & Ruby, 2009: 506）。這真是道出國際關係論研究（或社會科學）的根本弱點，就是如何「證明」與爲什麼要「證明」的議題，即是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或是我們能知道什麼，我們如何知道，這些後設哲學爭論是始終無解的。但是實用建構主義的目的即是在避免這類無謂的爭論，不能以此作爲批評，因爲實用建構主義學者正在積極以經驗研究個案說明實用主義的務實推理與務實效用，例如在 2002 年、2007 年與 2009 年的實用主義專輯期刊中，個案研究的論文是增多的。隨著實用建構主義個案研究的務實效用增多和增強，國際關係學者就樂於運用實用（建構）主義在國際關係研究之中，而避免沒有意義的後設理論爭論。

三、實用建構主義知識論在建構主義內部的挑戰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知識論焦慮或爭論，主要聚焦於 Wendt 以科學實存論爲本體論及實證主義爲知識論的建構主義，實用建構主義學者批評此科學哲學基礎，尤其是 Kratochwil 將科學實存論視爲是知識論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批評，遂引發 Wendt、Wight、Jamie Morgan、Heikki Patomäki 等科學實存論者的回應與批評。兩方爭論的議題聚焦於本體論與知識論，前者反對科學實存論以本體論爲先的主張，認爲知識論較重要，但不是忽略本體論；後者則是認爲本體論優先，當本體論確定了，知識論也就確立了。但是如何衡量與判斷雙方主張的正確性是否實用主義的知識論正是建構主義能成爲「建橋計劃」的哲學基礎嗎？就此而言，Checkel 和 Adler 的觀點就值得進一步關注與研究了，他們即是以務實的觀點建立其「建橋計劃」（莫大華，2009）。Kratochwil 與 Wight 的爭論又和 Steve Smith 與 Wendt 的爭論並無不同，實用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知識論的立場，各種哲學主張都可以從對話的觀點而促進國際關係學科的認同感。即使 Haas 父子嘗試以實用主義作爲互補的知識論，意圖超越知識論而發展社會科學共識，可以引導真實世界改變的程序（Haas & Haas, 2009: 104）。甚至 Kratochwil 進而將實用主義視爲是實踐科學（science as practice）而不是知識論（Kratochwil, 2009: 11-25），致使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爭論，只能是對話而似乎不可能獲致「共識」，遑論「發現」真理了。當然，這原本就不是實用建構主義的目的，其目的就在於務實對話，以問題爲取向而尋求實踐或共識。正因如此，實用建構主義內部才能容納了許多有知識論差異的建構主義學者或國際關係學者，回歸基本與重返實務，而不要過分爭論後設理論議題。

四、實用建構主義知識論優勢的挑戰

實用（建構）主義在國際關係的運用實踐，即可說明其知識論觀點如其所說爲國際關係研究有所貢獻，引用實用主義進入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內，並非是要引發另一場無謂的「後設理論」爭論，其目的是要突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多元性與實用性，尤其當實用建構主義強調實務，重視問題取向而提供務實的推理與判斷，有助於國際關係實務者理解。同時，它也可以強調理論的潛在作用，甚至理論者在公共領域的角色，使得它在理論與實踐上，都有所貢獻（Widmaier, 2004）。而且實用主義是以「嘗試錯誤」（trail-and-error）的研究方式，尋找出適當的人類知識與世界之間的基本連續關係（Kangas, 2009）。這樣的理論與實踐並重的知識論優勢，是受到上述提及學者的批評，但實用主義有助於建構主義脫離後設理論的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識地位，因爲其強調實踐與行動而能使建構主義避免過於與主流理論爭論本體論議題，又能以實質問題結合其研究方法的多元，使建構主義原有的方法論多元性更能綜合。

總而言之，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理論重新回到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即是在於理論實踐或解決問題，以實質問題爲研究取向而不是爲理論而理論化國際關係。簡言之，它無意於國際關係理論的過分哲學化或後設理論化，但它不是排斥理論化的研究，而是希望多強調實務與務實的推理。更重要的是，它鼓勵學者之間的對話，無論是不同理論學派學者之間，或是同理論不同論點學者之間的對話。或許這正代表著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對於從第三次大辯論以來的後設理論辯論提出的反思，尤其是實用建構主義鼓勵多元主義與對話，將有助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相互學習與增強，但也由於其本身仍以實用主義哲學論述爲基礎，是否也陷入後設理論的爭論呢？是值得關注其未來的發展。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李幼蒸譯，1994，《哲學與自然之鏡》，台北：桂冠圖書。譯自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姜文閔譯，1992，《我們如何思維》，台北：五南。譯自 John Dewey. *How We Think*. Boston: D.C. Heath & Co. 1910.

徐文瑞譯，1998，《偶然、反諷與團結：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政治想像》，台北：麥田圖書。譯自 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莫大華，2006a，〈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建橋計劃：知識論的對話與綜合〉，《復興崗學報》，87: 231-240。

莫大華，2006b，〈國際關係理論的辯論、對話與綜合－美國『防止擴散安全提議』國際規範的個案分析〉，《問題與研究》，4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7-60。

莫大華，2007，〈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劃－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政治科學論叢》，31: 175-216。

莫大華，2009，〈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知識論差異與方法論多元〉，《問題與研究》，48(3): 63-95。

郭博文，1982，〈杜威的經驗自然主義〉，《台大哲學論評》，11: 51-79。

劉宏信譯，2005，《真理的意義》，台北：立緒文化。譯自 William James. *The Meaning of Truth: a Sequel to "Pragmatism."* N.Y.: Longmans, Green. 1927.

劉宏信譯，2007，《實用主義》，台北：立緒文化。譯自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London: N.Y.: Routledge. 1992.

鄧曉芒譯，2005，《實用人類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譯自 Kant Immanuel.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8.

二、英文部分

Adler, Emanuel. 1997. "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3): 319-363.

Adler, Emanuel. 2002.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s.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 Beth A. Simmon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95-118.

Adler, Emanuel. 2005. *Communitar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pistemic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Baert, Patrick. 2008. "A Neopragmatist Agenda for Social Research." In *Pragmat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s. Harry Bauer and Elisabetta Brighi. New York: Routledge, 47-64.

Balzacq, Thierry. 2005. "Pragmat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Mar 05, Hilton Hawaiian Vill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onolulu, Hawaii.

Bauer, Harry & Elisabetta Brighi. eds. 2009a. *Pragmat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Bauer, Harry & Elisabetta Brighi. 2009b. "Introducing Pragmatism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ragmat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s. Harry Bauer and Elisabetta Brighi. New York: Routledge, 1-8.

Bauer, Harry and Elisbetta Brighi, 2009c. "Conclusions: On the Obstacles and Promise of Pragmat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ragmat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s. Harry Bauer and Elisabetta Brighi. New York: Routledge, 163-170.

Bernstein, Richard J. 1992. *The New Constellation: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 Cambridge: MIT Press.

Bohman, James. 2002. "How to Make a Social Science Practical: Pragmatism, Critical Social Science and Multiperspectival Theory." *Millennium* 31(3): 499-524.

Brown, Chris. 2007. "Situating Critical Realism." *Millennium* 35(2): 409-416.

Buchler, Justus. ed. 1995.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Büger, Christian & Trine Villumsen. 2007. "Beyond the Gap: Relevance, Fields of Practice and the Securitizing Consequences of (Democratic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10: 417-448.

Büger, Christian. 2007. "Reassembling and Disse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actice from a Science Studies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8(1): 90-110.

Burks, Arthur W. ed. 1958.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7-8: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view, Correspondence and Bibl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erteau, Michael. 197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C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Checkel, Jeffrey T.2001.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3): 553-588.

Chernoff, Fred. 2007. "Critical Realism, Scientific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35(2): 399-407.

Cochran, Molly. 1999. *Normativ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ragmatic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chran, Molly. 2002. "Deweyan Pragmatism and Post-positivist Social Science in IR." *Millennium* 31(3): 525-548.

De Langhe, Rogier, Erik Weber & Jeron Van Bouwel. 2007. "A Pragmatist Approach to the Plurality of Explan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Graham Allison's Account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Reconsider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Pan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ptember 12-15, Turin Italy.

Deibert, Ronald J. 1997. "'Exorcismus Theoriae': Pragmatism, Metaphors, and the Return of Medieval IR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2): 167-192.

Dewey, John. 1902. "The Evolutionary Method as Applied to Morality." *Philosophical Review* 11:107-124.

Dewey, John. 1917. "Duality and Dualism."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14: 491-493.

Dewey, John. 1929.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The Later Work s of John Dewey (Volume 4)*,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25-1953.

Dewey, John. 1933. *How We Think* (2nd ed.). Boston: D.C. Health & Co.

Dewey, John. 1962. *A Common Fai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wey, John. 1983."The Influence of Darwinism on 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Vol.4, 1899-1924: Essays on Pragmatism and Truth, 1907-1909*,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Souther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3-14.

Dewey, John. 2000. “Experience and Nature (Revised edition).” In http://www.brocku.ca/MeadProject/Dewey/Dewey_1902a.html. Latest update 4 December 2009.

Eriksson, Johan & Giampiero Giacomello. 2006.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relevant Theo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7(3): 221-244.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07. “The (Re-)turn to Practice: Thinking Pract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Studies.” In http://www.iue.it/Personal/Researchers/bueger/practice%20workshop/Practice%20workshop%20Programme.pdf. Latest update 24 August 2009.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08. “Workshop on Practical Reason.” In http://www.iue.it/SPS/Research/FK_Wkshp_Oct08.html. Latest update 24 August 2009.

Festenstein, Matthew. 2002. “Pragmatism’s Boundaries.” *Millennium* 31(3): 549-571.

Finnemore, Martha & Kathryn Sikkink. 2001. “Taking Stock: The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319-436.

Finnemore, Martha. 2003. *The Purpose of Intervention: Changing Beliefs About the Use of For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riedrichs, Jorg. 2004. *European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House with Many Mansions*. New York: Routledge.

Friedrichs, Jorg & Friedrich Kratochwil. 2009. “On Acting and Knowing: How Pragmatism Can Adv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and Methodolog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3(4): 701-732.

Gadinger, Frank. 2006. “Practices of Security in the Light of 9-11: from a US-Identity Crisis to a ‘Crusade for Freedo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nel “Taking practices seriously. Exploring the consequenc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f the practice turn for IR and security studies from Bourdieu to Latour", at the 1st ECPR Graduate Conference, September 07-09, Essex.

Guillaume, Xavier. 2005. "Normative Constructivism: Pragmatism and Relationa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Hilton, Mar 05, Hawaiian Village, Honolulu, Hawaii.

Haas, Peter M. & Ernst B. Haas. 2002a. "How We Learned to Escape Physics Envy and to Love Pluralism and Complexity." In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eds. Frank P. Harvey and Michael Breche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34-245.

Haas, Peter M. & Ernst B. 2002b. "Pragmatic Constructirism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illennium 31(3): 573-601*.

Haas, Peter M. & Ernst B. Haas. 2009. " Pragmatic Constructivism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Pragmat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s. Harry Bauer and Elisabetta Brighi. New York: Routledge, 103-123.

Halliday, Fred. 1996.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ars and Hope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eds.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8-327.

Hartshorne, Charles & Paul Weiss. eds. 1958. *The Collected Paper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1931-1935, 195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ellmann, Gunther. 2003. "In Conclusion: Dialogue and Synthesis in Individual Scholarship and Collective Inqui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5(1): 147-150.

Hellmann, Gunther. ed. 2009. "The Forum: Pragmat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1(3): 638-6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olsti, Kalevi J. 2001. “Along the Road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the Next Millennium: Four Travelog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eds. Robert M. A. Crawford and Darryl S. L. Jarvis New York: SUNY Press, 73-99.

Isacoff, Jonathan B. 2002. “On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ase for a ‘Dewey Reconstruction’.” *Millennium* 31(3): 603-626.

Isacoff, Jonathan B. 2006. *Writing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Pragmatism and Historical Inquiry*. Lanham, MD: Lexington.

Jackson, Patrick Thaddeus. 2008. “Foregrounding Ontology: Dualism, Monism and IR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4(1): 129-153.

James, William. 1968. “Does ‘Consciousness’ Exist?” In *Writings of William James*, ed. John McDermott.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69-170.

James, William. 1981. *Pragmatism and the Meaning of Tru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okela, Minna. 2008. “A Pragmatist Ethic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Glob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WISC), July 23-26, Ljubljana, Slovenia.

Joseph, Jonathan. 2007. “Philosop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cientific Realist Approach.” *Millennium* 35(2): 345-359.

Jupille, Joseph, James A. Caporaso & Jeffrey T. Checkel. 2003. “Integrating Institutions: Rationalism, Constructivism, and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6(1-2): 7- 40.

Jutersonke, Oliver & Philipp Stucki. 2007. “Consolidating Content and Discourse Analysis: Pragmatism and Context-Sensitive Content Analysi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 Annual Convention, 27 February-3 March, Chicago.

Kangas, Anni. 2009. “From Interfaces to Interpretants: A Pragmatis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xploration into Popular Culture 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38(2): 317-343.

Katzenstein, Peter J. & Rudra Sil. 2004. "Rethinking Asian Security: A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eds. J. J. Suh,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Allen Carls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33.

Kratzenstein, Peter & Rudra Sil. 2008. "Eclectic Theorizing in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s.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47.

Klotz, Audie & Cecelia Lynch. 2007.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monk, NY: M. E. Sharpe.

Kratochwil, Friedrich. 2006. "Constructing a New Orthodoxy? Wendt's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eds.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London: Routledge, 21-47.

Kratochwil, Friedrich. 2007a. "Evidence, Inference, and Truth as Problems of Theory Build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ory and Eviden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s. Richard Ned Lebow and Mark Irving Lichba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5-54.

Kratochwil, Friedrich. 2007b. "Looking Back from Somewhere: Reflections on What Remains 'Critical' in Critic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5(S1): 25-45.

Kratochwil, Friedrich. 2007c. "Of False Promises and Good Bets: a Plea for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heory Building(the Tartu Lec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10(1): 1-25.

Kratochwil, Friedrich. 2007d. "Of Communities, Gangs, Historicity and the Problem of Santa Claus: Replies to My Critics." *Journal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10(1): 57-78.

Kratochwil, Friedrich. 2007e. "Re-thinking the 'in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illennium* 35(3): 495-511.

Kratochwil, Friedrich. 2009. "Ten Points to Ponder about Pragmatism: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Knowledge Gener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 In P*ragmat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s. Harry Bauer and Elisabetta Brighi. New York: Routledge, 11-25.

Kurki, Milja & Colin Wight. 2007.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eds. Tim Dunne,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33.

Kurki, Milja. 2007. "Critical Realism and Cause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35(2): 361-378.

Locher, Birgit & Elisabeth Prugl. 2001. "Feminism and Constructivism: Worlds Apart or Sharing the Middle Grou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5(1): 111-129.

Michal, Koran. 2007. "Intrinsic Value in Pragmatism: Trojan Horse or Savyor?" Paper presented at SGIR 6th Pan-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ptember 12-15, Turin, Italy.

Moteiro, Nuno P. & Keven G. Ruby. 2009. "The Promise of Foundational Prudence: A Response to Our Cr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1(3): 499-512.

Neumann, Iver B. 2008. "Returning Practice to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Case of Diplomacy." In *Pragmat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s. Harry Bauer and Elisabetta Brighi. New York: Routledge, 82-99.

Owen, David. 2002. "Re-orien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Pragmatism, Pluralism and Practical Reasoning." *Millennium* 31(3): 653-673.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868 (1955). "Some Consequences of Four Incapacities." *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ed. Justus Buchl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28-2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877 (1955). “The Fixation of Beliefs.” 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ed. Justus Buchl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5-22.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903a (1955). “Abduction and Induction.” 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ed. Justus Buchl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50-156.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903b (1955). “The Essentials of Pragmatism.” 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ed. Justus Buchl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51-252.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903c (1958). “Lectures on Pragmatism.” I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5)*, eds.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05.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903d (1958). “The Reality of Thirdness (From Lowell Lectures on Logic).” I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1)*, eds.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43-352.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905 (1966). “Issues of Pragmaticism.” In *Charles S. Peirce: Selected Writings*, ed. Philip P. Wien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3-225.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906 (1955). “Pragmatism in Retrospect: A Last Formulation.” 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ed. Justus Buchl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69-289.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940 (1955). “The Principles of Phenomenology.” 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ed. Justus Buchl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74-97.

Pouliot, Vincent. 2007. “‘Sobjectivism’: Toward a Constructivist Methodolog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1(2): 359-384.

Pouliot, Vincent . 2008. “The Logic of Practicallity: 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2 (Spr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57-288.

Puchala, Donald J. 2002. "Introduction: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oject and Procedure." In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sessing an Academic Field*, ed. Donald J. Puchala.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Rorty, Richard.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rty, Richard.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rty, Richard. 1991.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rty, Richard. 1992.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uggie, John G. 1999.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ds.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15-245.

Rytovuori-Apunen, Helena. 2005. "Forget 'Post-Postitivist'IR!: The Legacy of IR Theory as the Locus for a Pragmatist Tur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0(2): 147-177.

Sil, Rudra & Peter J. Katzenstein. 2005. "What Is Analytic Eclecticism and Why Do We Need It? A Pragmatist Perspective on Problems and Mechanisms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ptember 1-4, Washington D.C.

Teti, Andrea & Nikola Hynek. 2007. *Saving Identity from Postmodernism? Disciplining Constructivism and Gov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enius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Editors. 2002. “Editorial Note.” *Millennium* 31(3): p.iii-iv.

Tierney, Michael & Catherine Weaver. 2005. “Principles and Principles? The Possibilities for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Meeting in Honolulu, March 5, Hawaii.

Turrisi, Patricia Ann. ed. 1998. *Pragmatism as a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Right Thinking: the 1903 Harvard Lectures on Pragmatism by Charles Sanders Peirce*.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agner, Wolfgang, Rainer Baumann & Gunther Hellmann. 2001. “Agent, Structures, and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Unification: From Metatheory to Empirical Enqui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2nd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20-24 February, Chieago.

Wendt, Alexander. 1987.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3): 351-352.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ndt, Alexander. 2006.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In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eds.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New York: Routledge, 181-219.

White, Stephen. 2002. “The Very Idea of A Critical Theory: A Pragmatist Tur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28, Boston, Massachusetts.

Widmaier, Wesley W. 2004. “Theory as a Factor and the Theorist as an Actor: The ‘Pragmatist Constructivist’ Lessons of John Dewey and John Kenneth Galbraith.”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6(3): 427-4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iener, Antje. 2006.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uzzles and Promises.” In https://www.wiso.uni-hamburg.de/fileadmin/sowi/politik/governance/ConWeb_Papers/conweb5-2006.pdf. Latest update 24 August 2009.

Wight, Colin. 2007a. “Inside the Epistemological Cave all Bets are Off.”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10(1): 40-56.

Wight, Colin. 2007b. “A Response to Friedrich Kratochwil: Why Shooting the Messenger does not Make the Bad News go awa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10(3): 301-315.

Wight, Colin. 2007c. “A Manifesto for Scientific Realism in IR: Assuming the Can-Opener Won’t Work!” *Millennium* 35(2): 379-398.

Zaiotti, Ruben. 2007. “Pragmaticist Exploration: C. S. Peirce, the Logic of Inquiry and World 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ixth Pan-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ptember 12-15, University of Turin, Ital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n the Epistemology of Pragmatic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ts Origins,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Ta-hua Mo**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been written in terms of "great debates" among different theories. After the third great debate, researchers moved in a more pragmatic direction and away from the metatheoretical debates of the past, particularly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troversy. After decades of effort, pragmatism emerged as a rising trend in the IR conferences, textbooks and journals. Some researchers havereferred to this as a "pragmatist turn" or "unexpected renaissance of pragmatism". Pragmatism has not only influenc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ut also has had an effect on the epistemological controversy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structivism. Constructivists such as Friedrich Kartochwil, Emmuel Adler, Peter M. Haas, and Ernst B. Haas have claimed a pragmatic constructivism, incorporating pragmatism as an epistemological stance against Alexander Wendt's scientific realism.Pragmatic constructivism argues thatIR should get back to the basics, that is, back to question-driven orientations, an appreciation of different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and an emphasis on practice. The aim is to develop a more practical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hilosophical pragmatism of Charles Peirce, Williams James, John Dewey, and Richard Rorty. The paper examines their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gmatism as a metatheoretic foundationfor pragmatic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E-mail: modahua@yahoo.com.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onstructivism. It also discusses epistemological issues, the relative strengths, and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s of pragmatic constructivism. Finally, the paper looks at the future challenges forpragmatic constructivism.

Key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onstructivism, Pragmatism, Pragmatic Constructivis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